

民国报刊所见“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 藏文翻译问题*

励 轩 叶西勘卓

[提要] 民国中央政府先后出版了多种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其目的在于向藏族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传达政令、沟通消息等。这些刊物往往会刊载政治宣传性较强的内容并将之译为藏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其中经常涉及到与现代中国认同密切关联的“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而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可以视为民国中央政府在藏族同胞中形塑现代中国认同的重要一步。通过对这些刊物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帮助了藏族知识精英在母语环境中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这些概念藏文翻译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翻译的规范化工作做得不足,相关词汇的藏文翻译混杂多变,加之刊物实际受众较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藏族同胞中的普及,不利于当时藏族同胞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

[关键词] 藏文 报刊 翻译 民族 中华民族

认同的形成往往是与诸多关键符号在共同体内的出现、发展与传播密切相关,而“中华民族”概念则正是这样的关键符号之一。研究“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发展与传播是厘清现代中国认同形成的重要一环。正是意识到这一重要价值,学界已有不少人投身于“中华民族”概念史研究,并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不过,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大多数成果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华民族”概念在汉文语境中使用、流通和认同的情形,而对相关概念进入少数民族文字的研究却极少(黄兴涛 2020),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少数民族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有鉴于此,笔者曾利用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和维吾尔文翻译(励轩 2022)。“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说相关译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定型的,那么民国时期无疑是这些译词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笔者在先前的文章中,对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只是略微提及,而未及进行深入挖掘。在本文中,笔者充分利用民国时期发行的《藏文白话报》《蒙藏周报》《蒙藏旬报》《蒙藏半月刊》《蒙藏月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近代东部藏区商业贸易中藏族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研究(20VMZ005)”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研究专项“中华民族概念及历史脉络研究(21VMZ015)”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中央边报》这六种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①，来研究“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译词的形成与发展。以上六种刊物分别发行于民国时期的各个阶段，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入藏文的历史及在各个阶段的变化。此外，这六种刊物均由民国中央政府官方机构所办，研究这些刊物中“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译词的形成与发展，事实上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民国中央政府是如何通过印刷品在藏族同胞中进行国家认同建设（nation building）的。

一 《藏文白话报》中“中华”与“民族”概念的藏文翻译

民国建立之初，鉴于边疆地区信息闭塞，北洋政府担心外人煽惑离间。在“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的倡议下，该局于1912年9月开始筹备汉—藏文、汉—蒙古文、汉—回文（维吾尔文）合璧的三种白话报，并于1913年1月在北京正式发行（王梅堂 1994:65）。其中，《藏文白话报》为我国第一个汉—藏文合璧报刊，于1915年1月停刊，同年4月复刊，并更名为《藏文报》（བོད་ཡིག་གསར་འགྲུ་། bod yig gsar 'gyur^②）（徐丽华 1999:118）。《藏文白话报》的藏文版内容基本是汉文版内容的对照翻译，该报刊的发刊词中已述明“本报发刊其用意，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已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已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10）。

鉴于民国初年的基本国策为“五族共和”，是故《藏文白话报》所用话语多强调“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概念则不多用。在汉文版内容中，“中华民族”一词仅出现1处；而在藏文版内容中，译者甚至并未将该词翻译为藏文（励轩 2022）。所以在《藏文白话报》中实际上没有出现“中华民族”的藏文对译。不过，“中华民族”之“中华”与“民族”各自的藏文对译在《藏文白话报》中则频繁出现。“中华”含于“中华民国”中，常作为国家名称的组成部分出现。从报刊封面所标每期的出版信息内容可见，其翻译方式为音译。在刊物中出现了三个相似的译词，分别是ཀྲུང་མའ། (krung hwa)、ཀྲུང་མ། (krung hA) 和ཀྲུང་ཀ། (krung ha)（《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3、13、21）。三者的区别在于下加字不同，发音及意义并无太大差别。除作为国名之一部分出现外，“中华”有时也会单独出现，如该刊通过问答形式，对“中华”一词作出了解释。汉文原文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所有的地域就叫作中华……”，对应的藏译为རྒྱ་བོད་སོག་དང་མནུ་ཁ་ཅེ་སོགས་མི་རིགས་ཆེན་པོ་ལྔ་འདི་གང་ཡོད་ཀྱིས་ས་ཆ་ལ་ཀྲུང་ལྷེས་པ། (rgya bod sog dang manju kha che sogs mi rigs chen po lnga'i gang yod kysis sa cha la krung hA zhes pa)（《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116、119）。《藏文白话报》中这一小段对“中华”的解释，标志着现代意义的“中华”概念进入了藏文。

在《藏文白话报》中，“民族”一词常含于“五大民族（མི་རིགས་ཆེན་པོ་ལྔ། mi rigs che po lnga）”这一术语中，其藏文译词使用藏文中既有的མི་རིགས། (mi rigs) 一词；མི། (mi) 在藏文中有“人”

^① 以上六种刊物中，《藏文白话报》已被影印出版，其他五种可在《全国报刊索引》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找到，但部分期数散失。

^② 本文的藏文拉丁字母转写使用威利（Wylie）转写系统。

“民”的意思，*རིགས།* (rigs) 为“种”“类”“族”，合起来其实就是“民之族类”之意。《藏文白话报》使用 *མི་རིགས།* (mi rigs) 指称“民族”，则很可能是特定的藏文名词与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进行绑定的开始。尽管此后“民族”的其他藏文译词层出不穷，但 *མི་རིགས།* (mi rigs) 作为其中一种一直存续着，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民族”的官方标准译词使用而流行至今。在《藏文白话报》中，“民族”这一概念的表达，除了使用双音节词“民族”，还经常使用单音节词“族”。在藏文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将这类单音节的“族”也译成跟“民族”一样的 *མི་རིགས།* (mi rigs)，如“五族”译作 *མི་རིགས་ལྔ།* (mi rigs lng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25)、“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译作 *རྒྱ་དང་བོད་སོག་མཁུ་ཁ་ཆེད་མི་རིགས་ཆེན་པོ་ལྔ།* (rgya dang bod sog manju kha che'i mi rigs chen po lng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c:1266)、“五族须知”译作 *མི་རིགས་ལྔ་འདི་རེས་པར་དུ་སྟོན་པས།* (mi rigs lnga'i nges par du stogs p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b:824) 等。《藏文白话报》汉文版中还会使用具体族名与单音节“族”的固定搭配，形成“某族”或“某某族”这种专有名词，译者有时也将其中的“族”译成 *མི་རིགས།* (mi rigs) “民族”。如在《五族源流略考》一文中，“满族”被译作 *མཁུ་འདི་མི་རིགས།* (manju'i mi rigs) 或 *མཁུ་མི་རིགས།* (manju mi rigs)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d:2299-2302)。不过，单音节“族”并不总是译成 *མི་རིགས།* (mi rigs)，比如“五族”就被直接意译为 *རིགས་ལྔ།* (rigs lng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37)，即“族-五”。在这种译法中，藏文的“民族” *མི་རིགས།* (mi rigs) 被省称为“族” *རིགས།* (rigs)。这促成了“某族”或“某某族”另外一种藏文译法的出现，即相应的具体族名与单音节“族”的固定搭配，如“藏族” *བོད་རིགས།* (bod rigs)。详见下文。

虽然《藏文白话报》经常使用 *མི་རིགས།* (mi rigs) 和 *རིགས།* (rigs)，但并没有统一“民族”或“族”的藏文译词。在《五族源流略考》一文中，出现了“满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的藏文对译。其中，“藏族”之“族”的翻译与上文提及的“满族”一样，采用了 *མི་རིགས།* (mi rigs) 一词^①。但是，“蒙古族”与“回族”之“族”则译成了 *རྒྱུད་རིགས།* (rgyud rigs)。*རྒྱུད།* (rgyud) 在藏文中有“族”“种”之意，也有“世系”“后裔”之意，比较偏重血缘。*རྒྱུད་རིགས།* (rgyud rigs) 合起来其实是“种族”的意思。文中，“蒙古族”译作 *སོག་པོའི་རྒྱུད་རིགས།* (sog po'i rgyud rigs) 或单译作 *སོག་པོ།* (sog po)，即“蒙古种族”或“蒙古”之意；“回族”译为 *ཁ་ཆེད་རྒྱུད་རིགས།* (kha che'i rgyud rigs)，即“穆斯林种族”之意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d:2299-2302)。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种族”的含义是不同的，满人乌泽声在《满汉问题》中曾言：“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是以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乌泽声 1907:10-11) 按照乌泽声的观点，“五族”其实应作“五大种族”来理解。《藏文白话报》的藏文译者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此类种族观的影响，但又碍于汉文版中已将“五族”称为“五大民族”，因此只好作一妥协，只将“蒙古族”与“回族”之“族”译成了“种族” *རྒྱུད་རིགས།* (rgyud rigs)。在《五族源流略考》中，“汉族”的藏文翻译又不同于以上几种，译作 *རྒྱ་མིའི་རིགས།* (rgya mi'i rigs)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d:2299)，或单字 *རྒྱ།* (rgy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d:2300)。*རྒྱ་མིའི་རིགས།* (rgya mi'i rigs) 中的 *རྒྱ་མི།* (rgya mi) 指“汉人”，*འི་* ('i) 为藏文属格助词，意为“的”，连起来可以

^① “藏族”在文章中被称为“西藏民族”，其翻译为 *བོད་ཀྱི་མི་རིགས།* (bod kyi mi rigs)。

理解为“汉人之种”。《藏文白话报》中，汉、满、蒙、回、藏五族之“族”的藏文译法出现了三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藏文译者对“族”之认识、理解与运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但从积极意义的一面来说，《藏文白话报》对“族”“民族”以及“中华”等词的诸多藏文翻译尝试，使得现代意义的“中华”和“民族”概念第一次大规模地通过翻译进入藏文，同时也为之后一些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翻译“中华民族”相关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 《蒙藏周报》与藏文翻译“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

继《藏文白话报》后，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于1929年在南京编辑发行了多文种合璧的《蒙藏周报》。该刊物的性质与《藏文白话报》类似，都是民国中央政府主办的政治宣传性刊物，内容以“阐扬总理遗教，启迪蒙藏民智，传布政令，沟通消息，说明蒙藏处地之危险，介绍实际情形于国人”（佚名 1929 1.2:2）为主。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借助这份刊物来唤醒蒙古族、藏族同胞一起完成国民革命，共同建设“中华民国”。《蒙藏周报》为汉文、蒙古文、藏文三文合璧刊物，蒙古文、藏文版内容主要译自汉文版，其管理团队也来自汉族、蒙古族、藏族三个民族，其中社长由“蒙藏委员会”蒙古族委员克兴额担任，副社长由“蒙藏委员会”藏族委员格桑泽仁担任，边政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汉族黄奋生任主编（喜饶尼玛、李子君 2021:54-55）。格桑泽仁的巴塘藏族老乡刘家驹 1929 年到南京后，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并兼任《蒙藏周报》藏文股主任一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 2005:6）。

在《蒙藏周报》1930年发表的《中大蒙藏班学生之责任》一文的藏文版中，笔者发现了可能是迄今为止藏文“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处。文章由《蒙藏周报》主编黄奋生所写，其汉文原文为“中央复令国立中央大学添设蒙藏班……此固为中央扶植蒙藏两民族之惨淡经营，抑亦为巩固中华民族复兴之先声”（奋生 1930:1）。在对应的藏文部分，“中华民族”被译为 ལུང་འོག་མི་རིགས། (krung hog mi rigs)（佚名 1930 40:藏文部分第2页）。该词中的“民族”沿用《藏文白话报》中频繁使用的译法，译为 མི་རིགས། (mi rigs)；“中华”虽仍采用音译的方法，但与《藏文白话报》中出现过的 ལུང་ཤ། (krung hwa)、ལུང་ཤ། (krung hA) 和 ལུང་ཤ། (krung ha) 不同，译作 ལུང་འོག་ (krung hog)。《藏文白话报》与《蒙藏周报》对“中华”一词的不同藏文音译可能与译者所依凭的汉语口音不同有关，《藏文白话报》的三种音译应是来自“中华”的北京话口音，而《蒙藏周报》所译的 ལུང་འོག་ (krung hog) 可能是来自“中华”的吴语口音（励轩 2022）。遗憾的是，民国时期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的藏文部分多不标明译者，这篇文章也一样，所以就无法确定文中“中华民族”一词的藏文翻译者。我们只能推测应是精通汉—藏双语文且当时在《蒙藏周报》任职的巴塘藏族精英格桑泽仁或刘家驹所译，由于刘家驹是藏文股主任，是他翻译的可能性更高一些^①。

与“中华民族”一词仅出现一次不同，“民族”在《蒙藏周报》中倒是常用词。“民族”通常是译成《藏文白话报》中既已常用的 མི་རིགས། (mi rigs) 一词。不过 མི་རིགས། (mi rigs) 除了

^① 《蒙藏周报》的翻译工作往往由“蒙藏委员会”职员兼任，精通汉—藏双语文的杨质夫当时也在“蒙藏委员会”编译室担任翻译，虽然目前尚未找到杨质夫在《蒙藏周报》兼职的明确证据，但不排除“中华民族”一词也可能是杨质夫所译。

作为“民族”的译词,《蒙藏周报》译者还赋予了它“人民”的含义,如将汉文版内容中的“内地人民”译作 རྒྱ་ནག་གི་མི་རིགས་རྣམས། (rgya nag gi mi rigs rnams) (佚名 1931 58:藏文部分第6页)。除了 མི་རིགས། (mi rigs) 这个译词外,该刊物还会使用意译的藏文词 མི་མེད་གྱི་རིགས་བརྒྱུད། (mi ser gyi rigs brgyud) (佚名 1929 1.2:藏文部分第12页)与 མི་མེད་རིགས་བརྒྱུད། (mi ser rigs brgyud) (佚名 1930 40:藏文部分第5页)来翻译“民族”。མི་མེད། (mi ser) 在藏文中有“百姓”“人”“民”之意;གྱི་(gyi) 为藏文属格助词,意为“的”;རིགས་བརྒྱུད། (rigs brgyud) 则是藏文中早就存在的词汇,乔玛(Csoma de Körös 1834:234)就将之译为“种族”“世系”,有“血统”“后裔”之意,偏重血缘。故这后两个表示“民族”的藏文译词是“民之后裔”之意。与 མི་རིགས། (mi rigs) 相比,མི་མེད་གྱི་རིགས་བརྒྱུད། (mi ser gyi rigs brgyud) 或 མི་མེད་རིགས་བརྒྱུད། (mi ser rigs brgyud) 在《蒙藏周报》中的使用频率不高,仅出现了寥寥数次,其中一次用于“民族主义”之“民族”的翻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蒙藏周报》在藏文翻译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即把“藏族”之“族”与藏族传统部落之“族”进行了区分。在题为《青海藏族民众应选派代表参加西藏会议》的文章中,“藏族”一词的译词出现了不同于《藏文白话报》中常见的 བོད། (bod) “藏”与 བོད་གྱི་མི་རིགས། (bod kyi mi rigs) “西藏民族”的两个译词,分别为 བོད་རིགས། (bod rigs) “藏族”和 བོད་པ། (bod pa) “藏人”(佚名 1931 57:藏文部分第6、7页);同时该文对青海的藏族“族”数进行了统计,将汉文中代表藏族传统部落的“族”翻译为 འཛོལ་ཁག། ('tsho khag)^① “部落”,如“玉树二十五族”被译为 ཡུལ་རྒྱུ་འཛོལ་ཁག་། (yul hru 'tsho khag 25),“海南八族”译为 ཧད་ལན་འཛོལ་ཁག་། (had lan 'tsho khag 8) (佚名 1931 57:藏文部分第7页),从而区分了“藏族”之“族”与代表藏族传统部落的“族”。

三 《蒙藏旬报》和《蒙藏半月刊》中“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

《蒙藏周报》的发行时间不长,1931年11月即改名为《蒙藏旬报》,从1933年7月起,由于经费减少,再更名为《蒙藏半月刊》(佚名 1933 3.1:1),不过它们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宣传刊物的性质并没有变。从《蒙藏旬报》开始,汉文版内容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次数增多,这可能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观念的进一步普及有关。但《蒙藏旬报》“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却未完全沿用《蒙藏周报》所译之 ཀྲུང་ཁོག་མི་རིགས། (krung hog mi rigs), 而是使用了新的译词——ཀྲུང་སློབ་མི་རིགས། (krung sgo'i mi rigs)^②, 直译的话其实是“中国的民族”或“中国民族”之意,其中 ཀྲུང་སློབ། (krung sgo) 为“中国”的音译。原《蒙藏周报》的藏族骨干格桑泽仁、刘家驹不再参与《蒙藏旬报》藏文编译工作,可能导致刊物在“中华民族”藏文译词使用方面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格桑泽仁于1931年获国民党中央委任为西康党务特派员,并于1932年初回到西南从事党务工作(王川 2009:29)。刘家驹1932年后虽可能

^① 原文中,该词藏文似有误,实际应为 འཛོལ་ཁག། (tsho khag)。

^② 汉、藏原文如下:“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རང་རྒྱུང་སློབ་མི་རིགས་འདི་འཛོལ་ཁག་གི་དུ་གོང་ལྷན་ཞུགས་པའི། (rang re krung sgo'i mi rigs 'di 'dzam gling du gong phud zhig red)” (佚名 1932 4.1-2:汉文部分第34页,藏文部分第27页)。此外,黄兴涛(2017:174)指出,《蒙藏旬报》另有两处“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即意为“所谓中华的民族”的 ཀྲུང་ལྷན་ཞུགས་པའི་མི་རིགས། (krun hwa zhes pa'i mi rigs) “中华民族”和意为“所谓中华的大民族”的 ཀྲུང་ལྷན་ཞུགས་པའི་མི་རིགས་ཆེན་པོ། (krun hwa zhes pa'i mi rigs chen po) “大中华民族”。黄兴涛所引用的两个译词中,ཀྲུང་སློབ། (krun hwa) “中华”是沿用《藏文白话报》的藏文音译,而此处则是将“中华”译成了 ཀྲུང་སློབ། (krung sgo) “中国”。

仍在“蒙藏委员会”任职，但实际上主要在承担九世班禅的秘书和翻译工作，经常陪同九世班禅到各地弘扬佛法（史风 2012:19）。有意思的是，《蒙藏旬报》译者在翻译其他国民政治共同体时，也会使用 *མི་རིགས།* (mi rigs) 一词，如把“日本人”与“美国人”之“人”都意译成 *མི་རིགས།* (mi rigs)。这样一来，“日本人”被译成了 *རི་སྒྲིན་གྱི་མི་རིགས།* (ri spin gi mi rigs)（佚名 1931 1.3:藏文部分第 1 页）或 *སྤུར་སྤན་གྱི་མི་རིགས།* (sbyar span gyi mi rigs)（佚名 1932 3.3:藏文部分第 5 页），即“日本的民族”；“美国人”被译成了 *ཨ་མི་རི་ཀའི་མི་རིགས།* (a mi ri ka'i mi rigs)（佚名 1932 2.2:藏文部分第 25 页），即“美利坚的民族”；与“中华民族” *ཀྲུང་གོ་མི་རིགས།* (krung sgo'i mi rigs)，即“中国的民族”，形成了对等关系。由此，我们发现《蒙藏旬报》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翻译逻辑，即“中华民族”在藏文里应作为“中国的民族”和“中国人”来理解，间接传递了“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全体国民这样一种观念。

在翻译“民族”时，《蒙藏旬报》除了沿用《藏文白话报》与《蒙藏周报》的译词 *མི་རིགས།* (mi rigs) 外，还使用了 *རིགས་བརྒྱུད།* (rigs brgyud) 和 *མིང་ཚུལ།* (ming tshul) 两个新译词。其中 *རིགས་བརྒྱུད།* (rigs brgyud) 更应作为“种族”来用，在《蒙藏旬报》中作为“民族”译词的情况极少。1931 年第 2 卷第 3 期的《注重中小学的训育》一文中，出现了“现代世界各民族”一说（佚名 1931 2.3:11），其中的“民族”使用了该译词，译文为 *རྒྱལ་ཁབ་གཞན་གྱི་རིགས་བརྒྱུད།* (rgyal khab gzhan gyi rigs brgyud)（佚名 1932 2.3:藏文部分第 20 页），大意是“其他国家的民族”，与汉文原文意思略有出入。*མིང་ཚུལ།* (ming tshul) 则为汉语“民族”的音译，在《蒙藏旬报》中曾被作为“民族英雄”之“民族”的译词。“民族英雄”的翻译在该刊 1932 年第 4 卷第 1-2 期“史料”（藏文版无题目）中共出现了两次。首次出现时，译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将“民族英雄”译作 *མིང་ཚུལ་དབྱིངས་ཤུང།* (ming tshul dbyings shung)；但在第二次出现时，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将其译作 *མི་རིགས་དཔལ་འཁོ།* (mi rigs dpa'bo)（佚名 1932 4.1-2:藏文部分第 28 页）。

从《蒙藏旬报》开始，在“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中，汉语借词的使用开始增加，这种趋势在之后的《蒙藏半月刊》中更为明显。在《蒙藏半月刊》中，“中华民族”的译词出现了一种新译法，即 *ཀྲུང་གོ་མིང་ཚུ།* (krung sgo'i ming tshu)（佚名 1934 3.2:藏文部分第 1、2 页）。这一藏文新译法主要由两个汉语借词组成，即 *ཀྲུང་གོ།* (krung sgo) “中国”和 *མིང་ཚུ།* (ming tshu) “民族”，其中 *མིང་ཚུ།* (ming tshu) 是汉语“民族”的音译，跟《蒙藏旬报》中出现过的“民族”音译词 *མིང་ཚུལ།* (ming tshul) 相比，只是少了藏文第二个字的后加字 *ལ།* (la)。这个“中华民族”藏文译词其实是“中国的民族”或“中国民族”之意。在对“民族”一词的翻译中，《蒙藏半月刊》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汉语音译的借词 *མིང་ཚུད།* (ming tshud)（佚名 1934 3.2:藏文部分第 2 页），这一新借词与 *མིང་ཚུལ།* (ming tshul) 和 *མིང་ཚུ།* (ming tshu) 相比，也只是藏文第二个字的后加字有所不同而已。《蒙藏旬报》和《蒙藏半月刊》藏文版中汉语借词的增多，与统一语言的“国语运动”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国语运动”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的看法，当时与“蒙藏委员会”关系极密切的民国奇女子刘曼卿就在 1936 年出版的书中提出，边疆地区民族矛盾之产生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语言文字的不统一，因此提议要在边疆教育中进行语言文字之统一（刘曼卿 1936:13）。《蒙藏半月刊》中，“民族”除了使用“中华民族”之“民族”的汉语音译词 *མིང་ཚུ།* (ming tshu) 外，也沿用了以上刊物中出现的 *མི་རིགས།* (mi rigs) 一词，但使用次数相对较少。此外，当仅出现“民族”的省称“族”时，有

时会将之译作 མིརྒྱུད། (mi rgyud), 其中 རྒྱུད། (rgyud) 意为“后裔”, 该词可以理解为“民之后裔”之意, 如“五族共和”被译作了 མིརྒྱུད་ལྗོན་པོ་མཉམ་པ་སྤྱད། (mi rgyud lnga po mnyam rub) (佚名 1934 4.1:藏文部分第 14 页)。

四 《蒙藏月报》与“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

1934年4月起, 出于改良编译、充实刊物内容的需要, 《蒙藏半月刊》再次改版, 并更名为《蒙藏月报》(佚名 1934 1.1:1)。起初仍为汉—蒙古—藏三文合璧, 中间曾增加维吾尔文, 成为汉—蒙古—藏—维吾尔四文合璧刊物, 但后又剔除维吾尔文, 直至1948年停刊。《全国报刊索引》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发行的部分《蒙藏月报》, 抗日战争期间的则散失严重, 仅存1941年第13卷第4、第8期及1943年第15卷第2期。

《蒙藏月报》发行之初, 恰逢“中华民族”观念处于大型普及阶段, 故该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愈加频繁。不过,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 《蒙藏月报》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藏文译词仍未统一, 甚至可以说更为混杂, 有如《蒙藏周报》之 ཀྲུང་ཁོག་མི་རིགས། (krung hog mi rigs) 一样音译兼意译的 ཀྲུང་ཁག་མི་རིགས། (krung hag mi rigs) (佚名 1934 2.1:藏文部分第 1 页)、ཀྲུང་ཁོའི་མི་རིགས། (krung ho'i mi rigs) (佚名 1937 6.4:藏文部分第 6 页)、ཀྲུང་ཁ་མི་རིགས། (krung ha mi rigs) (佚名 1937 7.1:藏文部分第 5 页), 还有如《蒙藏旬报》之 ཀྲུང་སློབ་མི་རིགས། (krung sgo'i mi rigs) 一样译作意为“中国的民族”的 ཀྲུང་སློབ་མི་རྒྱུད། (krung sgo'i mi rgyud) (佚名 1934 2.1:藏文部分第 10 页)、ཀྲུང་སློབ་མི་རིགས། (krung sgo'i mi rigs) (佚名 1934 2.3:藏文部分第 3 页), 更有如《蒙藏半月刊》之 ཀྲུང་སློབ་མིང་མུ། (krung sgo'i ming tshu) 一样基本由汉语音译构成的 ཀྲུང་ཁོ་མིང་མུ། (krung ho ming tshu) (佚名 1934 1.3:藏文部分第 2 页)、ཀྲུང་ཁོའི་ཀྲི་མིང་མུ། (krung ho'i kyi ming tshu) (佚名 1934 2.2:藏文部分第 1 页)、ཀྲུང་ཁོའི་མིང་མུ། (krung ho'i ming tshu) (佚名 1934 2.2:藏文部分第 1 页)、ཀྲུང་ཁོ་མི་མུ། (krung ha'o mi tshu) (佚名 1934 2.3:藏文部分第 5 页)、ཀྲུང་ཁོའི་མིང་མུ། (krung ha'o ming tshu) (佚名 1934 2.3:藏文部分第 16 页)、ཀྲུང་ཁོའི་མི་མུ། (krung ho'i mi tshu) (佚名 1935 2.5:藏文部分第 6 页)、ཀྲུང་ཁོའི་མིང་མུ། (krung ha'i ming tshud) (佚名 1935 3.4:藏文部分第 31 页)、ཀྲུང་ཁོ་མི་མུ། (krung ho min tshu) (佚名 1935 3.3:藏文部分第 12 页)、ཀྲུང་ཁོའི་མི་མུ། (krung ho'i min tshu) (佚名 1936 5.2-3:藏文部分第 1 页)。《蒙藏月报》的藏文译者甚至还会将汉文“中华民族”翻译成复数。笔者至少发现了四种这样的译法, 比如 ཀྲུང་ཁག་མིང་སློབ་མི་རིགས་ཚང་མ། (krung hag ming sgo'i mi rigs tshang ma) (佚名 1934 1.6:藏文部分第 3 页), 意为“中华民国的所有民族”; 又如 ཀྲུང་ཁོ་མི་སློབ་མིང་མུ་རྣམས། (krung ho mi sgo gi ming tshu rnams) (佚名 1934 2.2:藏文部分第 2 页), 意为“中华民国的诸民族”; 再如 ཀྲུང་སློབ་མི་བརྒྱུད་རྣམས། (krung sgo'i mi brgyud rnams) (佚名 1935 2.6:藏文部分第 3 页), 意为“中国的诸民族”; 还有 ཀྲུང་ཁོའི་མིང་མུ་རྣམས། (krung ha'i ming tshud rnams) (佚名 1935 3.4:藏文部分第 31 页), 意为“中华的诸民族”。

此外,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出版的《蒙藏月报》在“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方面还存在着大量删译及完全改变原文大意的译法。以该期刊 1935 年第 6 期为例, 首篇文章与第二篇文章中都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首篇中的汉文“处在这四面楚歌的环境, 欲免于

沦亡的悲运，我中华民族，惟有共同努力……”（佚名 1935 2.6:1）被译为གང་བྱས་ངོས་ཚོའི་ཕན་ཚུན་ཕྱོགས་བཞི་དགའ་བྱིལ་དུ་སྒྲུབ་པ་ལྟ་བུ། འདི་ལ་བརྟེན་པའི་ངོ་ཚོ་ཚང་མ་སེམས་པ་གཅིག་སྒྲིལ་ཐོག་ནས་རྩེ་བོ་ནི་བྱས་ཉེན་ཁ་ནས་ཐོན་ཐུབས་པ་བྱེད་དགོས། (gang byas ngos tsho'i phan tshun phyogs bzhi dgra gi dkyil du sdad pa lta bu, 'di la brten pa'i nga tsho tshang ma sems pa gcig sgril thog nas hur btson byas nyen kha nas thon thubs pa byed dgos) (佚名 1935 2.6:藏文部分第2页)，译者未译“中华民族”一词，而是用ངོ་ཚོ་ཚང་མ། (nga tsho tshang ma)“我们所有人”表达了其意。第二篇汉文版中共出现8次“中华民族”，译者将第1处“最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衰败，可算达到极点了”（佚名 1935 2.6:1-2）中的“中华民族”译作ཁུང་སྒོའི་མི་བརྒྱུད་རྣམས། (krung sgo'i mi brgyud rnam) (佚名 1935 2.6:藏文部分第3页)，意为“中国的诸民族”。第2处省略未译。第3、4处“中华民族，并不是向来如此的，中华民族过去，曾经有过很光荣的历史，曾经扬眉吐气，蜚声世界”（佚名 1935 2.6:2），其中第3处被译作同样具有整体性的ངོ་ཚོའི་རྒྱལ་ཁབ། (nga tsho'i rgyal khab) (佚名 1935 2.6:藏文部分第3页)，意为“我们的国家”；第4处则省略未译。之后4处都出现在原文提及的“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中，译者除省略了1处外，将其余3处“中华民族”分别译为ཁུང་སྒོ། (krung sgo)“中国”、མི་བརྒྱུད། (mi brgyud)“民族”、མི་བརྒྱུད་འདི། (mi brgyud 'di)“这个民族”（佚名 1935 2.6:藏文部分第3页）。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蒙藏月报》中表示国内各民族名称的藏文词也与该刊物中“中华民族”之翻译类似，显得十分混杂，各译词的使用语境也不统一。作为“民族”常用译词的མི་རིགས། (mi rigs)，在该刊物中也具有多个含义，被作为“人种”（佚名 1934 1.3:藏文部分第4页）、“族”（佚名 1934 1.3:藏文部分第26页）、“人类”（佚名 1934 1.3:藏文部分第50页）、“人民”（佚名 1934 1.6:藏文部分第46页）等的译词。当“民族”的省称“族”单独出现时，其译词也非常多样，且有新译词出现，如“五族”之“族”就有两个不同于以往的译词，即རུས་ཚོ། (rus tsho)与རིགས་རྒྱུད། (rigs rgyud)。在藏文中意为“父亲亲属”的རུས་ཚོ། (rus tsho)一词，与ལ། (lga)“五”连用，构成了རུས་ཚོ་ལ། (rus tsho lga)“五族”（佚名 1934 1.3:藏文部分第39页），“族”被译作རུས་ཚོ། (rus tsho)。《藏文白话报》中有时作为“种族”之译词的རིགས་རྒྱུད། (rigs rgyud)一词，在《蒙藏月报》中也有1处与ལ། (lga po)“五”连用，成为了“五族”的译词རིགས་རྒྱུད་ལ། (rigs rgyud lga po)（佚名 1934 1.4:藏文部分第8页），“族”即被译作རིགས་རྒྱུད། (rigs rgyud)。又如“汉族、满族、土族、蒙古族、回族、藏族”7个民族名称中之“族”，在《蒙藏月报》同一篇文章中的翻译也不一样。“汉族”“满族”“土族”之“族”使用རིགས་རྒྱུད། (rigs rgyud)“种族”一词，民族名分别被译为རྒྱའི་རིགས་རྒྱུད། (rgya'i rigs rgyud)、མན་ཇུའི་རིགས་རྒྱུད། (man ju'i rigs rgyud)、ཐུབ་ཚུབ་ཞེས་པའི་རིགས་རྒྱུད། (thub tshub zhes pa'i rigs rgyud)^①。“蒙古族”与“回族”之“族”使用རིགས། (rigs)“族”，二者分别被译为སོག་རིགས། (sog rigs)、ཁ་ཇེའི་རིགས། (kha che'i rigs)（佚名 1934 1.5:藏文部分第4-5页）。“藏族”之“族”出现了两个译词，一个是和རིགས། (rigs)，与“蒙古族”与“回族”之“族”一样；一个是新的译词བརྒྱུད། (brgyud)“种”。则“藏族”即被译作བོད་ཀྱི་རིགས། (bod kyi rigs)和བོད་བརྒྱུད། (bod brgyud)。值得注意的是，在《蒙藏月报》发行一段时间后，译者似乎意识到应减少译词太过混杂的情况。从1935年第3卷第1-2合期起，藏文译文中汉语音译词的使用频率开始变少，且有时使用མིན་ཚུ། (min tshu)“民

^① 意思为“称之为土族的族”，译者先对“土族”进行了音译，而后说明“土族”为“族”。

族”这一音译词时，会用括号括起来。而从1936年第6卷第3期开始，刊物中就没有再使用汉语音译词，而是混用མི་རིགས། (mi rigs) 和 མི་རྒྱུད། (mi rgyud)。到了1937年第6卷第6期直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刊物中“民族”的译词基本固定为了མི་རིགས། (mi rigs)。

现存的抗日战争期间的三期《蒙藏月报》中，“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仍较为混乱。1941年第4期(13.4:5-6)刊载的蒋介石《国民精神总动员二周年纪念广播讲词》一文中出现了三次“中华民族”，但藏文只译了其中两处。第一处是把“中华民族”译作ཀླུང་རྟོག་མིག་གོ། (krung hog min go)，即“中华民国”的完全音译。第二处则采用了更为复杂的音意结合译法，译作དཔལ་དཀྱིལ་མི་སེར་རྒྱལ་ཁབ། (dpal dkyil mi ser rgyal khab)；其中，“中华”的藏文译词དཔལ་དཀྱིལ། (dpal dkyil) 极为少见，དཔལ། (dpal) 为“吉祥”之意，在藏语安多方言中发音接近“华”，དཀྱིལ། (dkyil) 是“中央、中部、中心”。将“中华”译成དཔལ་དཀྱིལ། (dpal dkyil)，既兼顾到了音意结合的恰当性，又继承了藏文在地名、人名前加“圣”“吉祥”等敬语词的传统表达方式。其第二部分མི་སེར་རྒྱལ་ཁབ། (mi ser rgyal khab) 则可以理解为“人民国家”。所以整个藏文译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佚名 1941 13.4:藏文部分第7、15页)。1943年第2期(15.2:1-2)刊载的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文中出现的两处“中华民族”，一处译成རྒྱལ་ཁབ། (rgyal khab) “国家”，另一处则译成དཔལ་དཀྱིལ་མི་རིགས་ཙམ་མ། (dpal dkyil mi rigs tshang ma) (佚名 1943 15.2:藏文部分第1-2页)，意即“中华所有民族”。相对于“中华民族”译词的混乱，“民族”的藏文译词更统一一些，以1941年第4期与第8期出现的“民族”为例，基本上都译成常见的མི་རིགས། (mi rigs)。而到了1943年第2期，མི་རྒྱུད། (mi rgyud) 再次作为“民族”的译词而出现(佚名 1943 15.2:藏文部分第33页)^①。1943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编译发行的《藏文三民主义》一书中，译者也是将“民族”译成མི་རྒྱུད། (mi rgyud) (励轩 2022)。མི་རྒྱུད། (mi rgyud) 作为“民族”译词的扩大使用，可能与蒋介石在1942年和1943年大力倡导强调血缘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有关。

抗日战争胜利后，《蒙藏月报》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经过对这一时期共15期《蒙藏月报》内容的用词统计^②，笔者发现“中华民族”仅出现1处(佚名 1947 19.8-10:8)，且未译成藏文。“中华民族”出现频率的大幅度下降可能与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国家认同建设问题上的妥协有关。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族论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国民党内的很多少数民族精英也对这种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观持有不同看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格桑泽仁与出席大会的蒙古族、藏族及新疆全体代表更是联合提出议案，要求“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格桑泽仁 1946:35-36)。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之下，在其“六大”通过的政纲政策中，对“民族主义”的阐释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确立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及“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两条原则，对境内各少数民族也不用“宗族”之类矮称，而是代之以“民族”或“边疆民族”。而在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全文都未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倒是规定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① 汉文原文为：“提倡节约，发扬民族精神。”(佚名 1943 15.2:14)

^②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有1946年2期、1947年12期、1948年1期，总计15期。

(佚名 1947 3-4:21-26)。《蒙藏月报》第二个重要变化是“民族”藏文译词的规范和统一。笔者统计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的 15 期《蒙藏月报》44 处“民族”及其省称“族”的藏文翻译,其中 43 处使用了 མིརྒྱུད། (mi rgyud), 只有 1 处用了 མིརྒྱལ། (mi rigs)。从这个变化来看,主管《蒙藏月报》的“蒙藏委员会”可能意识到了规范和统一藏文译词的重要性。

五 《中央边报》中“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

《中央边报》创刊于 1945 年 10 月,是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军令部及政治部联合编译出版的月刊,1946 年 7 月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佚名 1946 4:2)。该刊物以“提供现代国民的文化教育之智识,并指示其时代动向”(佚名 1947 19.12:10)为目的,以汉、蒙古、藏、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出版,也是一份综合性政治刊物。与《蒙藏周报》《蒙藏旬报》《蒙藏半月刊》《蒙藏月报》等多文种合璧刊物不同,《中央边报》分别以汉—蒙古、汉—藏、汉—维吾尔双语方式出版。《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仅收录有 5 期汉—藏双语版本的《中央边报》,分别是 1946 年 7 月 1 日第 4 期、1946 年 11 月 1 日第 5 期、1947 年 1 月第 7-8 合期及 1947 年 2 月第 9 期。

在已搜集到的几期汉—藏双语《中央边报》中,“中华民族”一词并不多见,其原因应与《蒙藏月刊》一样,可能是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国家认同建设问题上妥协导致的民族话语调整。不过,《中央边报》倒还是出现了两个较新的“中华民族”藏文译词,分别为 ཀྲུང་ཁྲུམ་མི་རྒྱལ། (krung hA mi rigs)(佚名 1946 5:藏文部分第 3 页)和 དཔལ་དཀྱིལ་མི་རྒྱུད། (dpal dkyil mi rgyud)(佚名 1947 9:藏文部分第 1 页)。其中, ཀྲུང་ཁྲུམ་མི་རྒྱལ། (krung hA mi rigs) 是由音译“中华” ཀྲུང་ཁྲུམ། (krung hA) 和“民族” མི་རྒྱལ། (mi rigs) 构成,出现在卫慧林的《边疆语文应用问题》一文中。该文认为“中华民族是从文化观点上的总合名称”(卫慧林 1946:2)。 ཀྲུང་ཁྲུམ་མི་རྒྱལ། (krung hA mi rigs) 把《藏文白话报》中常用的“中华”及“民族”藏文译词组合在一起,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毛泽东选集》时所选用的藏文译词。组成 དཔལ་དཀྱིལ་མི་རྒྱུད། (dpal dkyil mi rgyud) 的 དཔལ་དཀྱིལ། (dpal dkyil) 和 མི་རྒྱུད། (mi rgyud) 也都是《蒙藏月报》中出现过的,合起来则是“中华民族”之意。

在“民族”的译词方面,相较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蒙藏月报》对译词的相对统一,《中央边报》却显得有些多样。除了使用翻译“中华民族”之“民族”所用的 མི་རྒྱལ། (mi rigs) 和 མི་རྒྱུད། (mi rgyud) 外,《中央边报》也使用其他译词。如《蒙藏周报》中常用于翻译“民族主义”之“民族”的 མི་མེད་རྒྱལ་བརྒྱུད། (mi ser rigs brgyud), 在《中央边报》中就被译者用于 མི་མེད་རྒྱལ་བརྒྱུད་ཀྱི་རྒྱལ་གནས་ཀྱི་བརྒྱུད་པ། (mi ser rigs brgyud kyi rig gnas kyi brgyud pa) “民族文化传统”(佚名 1946 5:藏文部分第 5 页)之“民族”的翻译。再如《藏文白话报》中有时用于翻译“种族”及《蒙藏月报》中有时用来翻译“五族”之“族”的 རྒྱལ་རྒྱུད། (rigs rgyud) 一词,在《中央边报》中也会被作为“民族”的译词之一,像“少数民族”,就被译为 རྒྱལ་རྒྱུད་ཅུང་བ། (rigs rgyud chung ba)(佚名 1947 7-8:藏文部分第 13 页)。“蒙藏委员会”所属《蒙藏月报》对“民族”译词的统一与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中央边报》在“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翻译上的多样化足以说明,两部门对规范“民族”译词的重要性认识是不同的,也表明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中

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翻译的规范与统一仍缺乏全盘考虑。不过，虽然《中央边报》的“民族”译词较为多样，但各译词的使用则较有规律。如上述卫慧林文章的译文中，除“民族文化传统”之“民族”使用了 མི་མེད་རིགས་བརྒྱུད། (mi ser rigs brgyud) 这一译词外，其他“民族”的译词均使用了 མི་རིགས། (mi rigs)；在第7-8合期中，“《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民族”都译作 མི་རྒྱུད། (mi rgyud) (佚名 1947 7-8:藏文部分第2、6、30、32、33页)；与“《中华民国宪法》”同期的《边事简志》中的“民族”则都译为 རིགས་རྒྱུད། (rigs rgyud) (佚名 1947 7-8:藏文部分第12、13、14、15、16、17页)。

六 结 语

通过对民国时期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相关的藏文译词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也存在着从少到多的变化。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之所以存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特点，不仅与民国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印刷品在藏族同胞中进行国家认同建设分不开，也跟“中华民族”观念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有关。而翻译“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一步帮助了藏族知识精英在母语环境中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同时，各种藏文翻译尝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这些概念的规范化翻译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实践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其中最明显的是规范化工作做得不够，相关藏文译词混杂多变。由于译词的混杂多变，加大了在藏文语境中区分国外民族、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的难度。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蒙藏委员会”似乎已经意识到规范与统一“民族”译词的重要性，并在其所属的《蒙藏月报》中进行了相关工作，但《中央边报》“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译词的多样性表明，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翻译的规范与统一仍缺乏全盘考虑。此外，民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能力有限，其所发行的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实际受众较小，只有少部分藏族知识精英能够读到。以上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藏族同胞中的普及，不利于民国时期藏族同胞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

参考文献

- [1]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a.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西南边疆·上·一》，合肥：黄山书社.
- [2]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b.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西南边疆·上·二》，合肥：黄山书社.
- [3]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c.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西南边疆·上·三》，合肥：黄山书社.
- [4]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 2013d. 《边疆民族旧刊续编·西南边疆·上·五》，合肥：黄山书社.
- [5] 奋 生. 1930. 《中大蒙藏班学生之责任》，《蒙藏周报》第40期.
- [6] 格桑泽仁. 1946. 《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全文》，西藏文化促进会《边人刍言》，南京：新大陆印刷厂.
- [7] 黄兴涛. 2017.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8] 黄兴涛. 2020. 《深化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研究》第6期.
- [9] 蒋介石. 1941. 《国民精神总动员二周年纪念广播讲词》，《蒙藏月报》第13卷第4期.

- [10] 蒋介石. 1943.《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蒙藏月报》第15卷第2期。
- [11] 励 轩. 2022.《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基于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12] 刘曼卿. 1936.《边疆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
- [13] 史 风. 2012.《西康历史人物刘家驹（1900-1977）及其边疆史地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4] 王 川. 2009.《格桑泽仁传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15] 王梅堂. 1994.《关于民国初年创办的藏文白话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
- [16] 卫慧林. 1946.《边疆语文应用问题》，《中央边报（汉—藏文）》第5期。
- [17] 乌泽声. 1907.《满汉问题》，《大同报》第1号。
- [18] 喜饶尼玛、李子君. 2021.《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康藏镜像：〈蒙藏周报〉琐议》，《中国藏学》第3期。
- [19] 徐丽华. 1999.《藏文白话报述要》，《中国藏学》第2期。
- [20] 佚 名. 1929.《发刊词》，《蒙藏周报》第1卷第2期。
- [21] 佚 名. 1931.《注重中小学的训育》，《蒙藏旬报》第2卷第3期。
- [22] 佚 名. 1933.《本刊启事三》，《蒙藏半月刊》第3卷第1期。
- [23] 佚 名. 1934.《本报启事一》，《蒙藏月报》第1卷第1期。
- [24] 佚 名. 1935.《民族复兴与武力自卫》，《蒙藏月报》第2卷第6期。
- [25] 佚 名. 1935.《十年来之中国边疆》，《蒙藏月报》第2卷第6期。
- [26] 佚 名. 1943.《抗建志要》，《蒙藏月报》第15卷第2期。
- [27] 佚 名. 1946.《本报启事》，《中央边报（汉—藏文）》第4期。
- [28] 佚 名. 1947.《边政·蒙藏委员会、教育部、中央组织部对边地文化事业供应一般》，《蒙藏月报》第19卷第12期。
- [29] 佚 名. 1947.《规定“七七”为陆军纪念日》，《蒙藏月报》第19卷第8-10合期。
- [30] 佚 名. 1947.《中华民国宪法全文》，《新生路月刊》第12卷第3-4合期。
- [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 2005.《巴塘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刘家驹专辑》，内部发行。
- [32] 佚 名. 1929. ཅན་སྒོ་ཏ་ཀང་བསྐྱར་འཕྲོལ། (《建国大纲》续)，《蒙藏周报》第1卷第2期。
- [33] 佚 名. 1930. གུང་ཡང་རྒྱ་ཞོག་པོད་སོག་ལག་གི་སློབ་མ་རྣམས་ཀྱི་འགན་ཁུར་མཛད་རྒྱུ་ལྷན་སྐྱོད། (中大蒙藏班学生之责任)，《蒙藏周报》第40期。
- [34] 佚 名. 1931. རྒྱལ་ཁབ་ཁྱེན་གྱི་ནང་མིང་ཚོགས་འདུའི་སྒོར། (全国内政会议)，《蒙藏周报》第58期。
- [35] 佚 名. 1931. མཚོ་སྒོན་པོད་རིགས་ནས་པོད་གྱི་ཚོགས་འདུའི་སྐབས་རོ་བཅར་ཞུ་རྒྱུ་ལྷན་སྐྱོད། (青海藏族民众应选派代表参加西藏会议)，《蒙藏周报》第57期。
- [36] 佚 名. 1931. རི་སྒྲིན་གྱི་འཕེལ་མ་རྒྱུ་ཡོད་མཁུ་སྒོན་མ་དབས་ཚེ་སྐབས་ནས་ལག་ཁྱེར་སྐྱོད་ཀྱི་ཡོད་ཀྱང་དོང་སྐབས་རི་གྱང་ཟིང་འཁྲལ་ལ་བརྟེན་ལག་ཁྱེར་མ་སྐྱོད་པའི་སྒོར། (以往日本进入中国，外交部会发出入证，但现在由于中日战争，不再发放出入证)，《蒙藏旬报》第1卷第3期。
- [37] 佚 名. 1932. ཚེ་ཡུའི་སྐྱུག་ནས་སློབ་གྲྭ་ལག་གོང་འཕེལ་མཛད་རྒྱུ་ལྷན་སྐྱོད། (教育部注重各学校的训育)，《蒙藏旬报》第2卷第3期。
- [38] 佚 名. 1932. ལྷུང་དམག་རེ་ཉོར་དུ་འཕྱོར་སྒོར། (日军犯热河)，《蒙藏旬报》第3卷第3期。
- [39] 佚 名. 1932. འོ་ཉེས་སྒོར། (天灾方面)，《蒙藏旬报》第2卷第2期。
- [40] 佚 名. 1932. (藏文)无题，《蒙藏旬报》第4卷第1-2合期。
- [41] 佚 名. 1934. གུང་སློབ་མིང་རྒྱ་མཉམ་རྒྱུ་ལག་གི་ལམ་སློབ་རྒྱུ་ལྷན་སྐྱོད། (中华民族整个对外)，《蒙藏半月刊》第3卷第2

期。

- [42] 佚名. 1934. གནས་སྤངས་མཚོ་ལྗོངས་ཀྱི་ས་གནས་ལ་བྱེད་གསལ་འཕུལ་གྱི་སྐོར། (甘肃青海之建设), 《蒙藏月报》第1卷第6期。
- [43] 佚名. 1934. གྲུང་ཅག་མི་རིགས་ཀྱི་གཞིན་རུ་རྒྱུ་མཚན་གྱི་ལས་འགན་གྱི་སྐོར། (中华民族青年之责任), 《蒙藏月报》第2卷第1期。
- [44] 佚名. 1934. གྲུང་ཅོལི་གྱི་མིང་རྒྱུ་ལ་གནད་ལུགས་དོ་ཤེས་པའི་སྐོར། (健全中华民族意识), 《蒙藏月报》第2卷第2期。
- [45] 佚名. 1934. གྲུང་ཅོལི་མི་རིགས་ཀྱི་སྐོར་འཆལ་རྒྱུ་ལ་ཕེལ་དུ་ཡོང་བ་བྱེད་དགོས་སྐོར། (中华民族心理的建设), 《蒙藏月报》第2卷第3期。
- [46] 佚名. 1934. ལམས་ཤོད་འཁྲུགས་འཛོལ་འཕུན་བཅོད་བྱ་རྒྱུ་འཆལ་གཞི་འདོན་པའི་སྐོར། (解决康藏纠纷之意见), 《蒙藏月报》第1卷第4期。
- [47] 佚名. 1934. ང་ཚོའི་ས་མཐར་གྱི་ཉེན་ཁའི་སྐོར། (我国边疆之危机), 《蒙藏月报》第1卷第6期。
- [48] 佚名. 1934. ཉ་ལ་རིན་པོ་ཆའི་རྣམ་ཐར། (达赖仁波切的传记), 《蒙藏半月刊》第4卷第1期。
- [49] 佚名. 1934. རྒྱབ་བྱང་དང་ལམས་ཤོད་གྱི་དོན་ལ་གནད་ཆེན་བྱེད་དགོས་སྐོར། (应如何注重西北与康藏), 《蒙藏月报》第2卷第3期。
- [50] 佚名. 1934. པཎ་ཆེན་རིན་པོ་ཆེ་ཤོད་ལ་ཆེབ་བསྐྱར་གནད་རྒྱུའི་སྐོར། (班禅仁波切回藏之事), 《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
- [51] 佚名. 1934. བོད་དོན་བཅོད་ལུགས་ཀྱི་འཆལ་གཞི་བཀའ་ཚུལ་འདེབས་བའི་སྐོར། (解决藏事原则之商讨), 《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
- [52] 佚名. 1934. བྱམས་སྤོང་ཇི་ལྟར་གྲོ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仁道正法论), 《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
- [53] 佚名. 1934. བོད་སོག་ཆབ་སྲིད་ཀྱི་སྐོར། (蒙藏政治方面), 《蒙藏月报》第2卷第3期。
- [54] 佚名. 1934. མཚོ་ལྗོངས་ཕྱོགས་ཀྱི་ཡིག་གཞི་བསྐྱོར་སྤོང་བྱེད་རྒྱུ་དང་སྐྱེ་བྱུ་སྤྱོད་རྒྱུའི་སྐོར། (推进青海文化), 《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
- [55] 佚名. 1934. མཚོ་ལྗོངས་ཀྱི་ཆབ་སྲིད་འཕུལ་ལུགས་སྐོར། (青海之政治建设), 《蒙藏月报》第1卷第5期。
- [56] 佚名. 1934. ཞང་ཅན་དཔོན་འབངས་རྣམས་ནས་སྐྱབས་མགོན་པཎ་ཆེན་རིན་པོ་ཆེར་ལྷུགས་སྤྱིན་གསོལ་སྐྱོགས་འདེབས་སྐོར། (沪市官民欢迎班禅大师), 《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
- [57] 佚名. 1934. ཤིང་ཅང་གི་དོན་ལ་སོ་གནས་བྱེད་དགོས་ལུགས་ཀྱི་སྐོར། (应怎样注重新疆问题), 《蒙藏月报》第2卷第1期。
- [58] 佚名. 1935. ཅང་ཨོ་ཡོན་ཀྱང་ནས་ཟེན་ཁྲིན་དཔོན་འབངས་རྣམས་ལ་བཀའ་སློབ་མཛད་པའི་སྐོར། (蒋委员长劝告四川绅耆), 《蒙藏月报》第3卷第4期。
- [59] 佚名. 1935. བོད་སོག་ས་གནས་ལ་གསལ་འཕུལ་དང་མི་སེལ་གྱི་སེམས། (蒙藏建设与民族心理), 《蒙藏月报》第2卷第5期。
- [60] 佚名. 1935. མི་བརྒྱུད་སྐྱར་རྒྱུ་ལོང་ཐབས་དང་རང་སྲུང་བྱ་ལུགས་ཀྱི་སྐོར། (民族复兴与武力自卫), 《蒙藏月报》第2卷第6期。
- [61] 佚名. 1935. ཡོན་ནན་གྱི་སྤྱི་འབངས་ཡོངས་ནས་ཅང་ཨོ་ཡོན་ཀྱང་ཡེབས་བསུ་ཞུས་པའི་སྐོར། (云南全体百姓欢迎蒋委员长), 《蒙藏月报》第3卷第3期。
- [62] 佚名. 1935. འོ་བརྒྱུད་ཤིང་ལ་དོས་ཚོ་ཀྱང་སྐོར་གྱི་སེམས། (十年来之中国边疆), 《蒙藏月报》第2卷第6期。
- [63] 佚名. 1936. གསལ་འཕུལ་གཞིགས་སེམས་ལ་དོ་ཤེས་བཀའ་བའི་སྐོར། (向新闻读者进行介绍), 《蒙藏月报》第5卷第2-3合期。
- [64] 佚名. 1937. བོད་སོག་ལས་ཁུངས་ཀྱི་སྤྱི་ལུགས་ལུ་ཡོན་ཀྱང་ནས་སྐྱབས་ཆེན་རིན་པོ་ཆེ་དང་རྒྱ་ཡང་བཅས་ལ་ཞལ་ལག་གནད་འདྲིན་ཞུས་ནས་གསུང་བྱོས་གནད་བའི་སྐོར། (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欢宴安钦沙王等之欢迎词), 《蒙藏月报》第7卷第1期。
- [65] 佚名. 1937. ལིང་ཀྱུ་ཞི་ནས་འོ་གསལ་ར་ཆོས་ཉེན་དབུས་གཞུང་སློབ་གྲྭ་གི་སྤྱི་ལུགས་ལུ་ཡོན་ཀྱང་ནས་གསུང་བྱོས་གནད་བའི་སྐོར། (梁主席于元旦在中央电台发表讲话), 《蒙藏月报》第6卷第4期。
- [66] 佚名. 1941. གོ་ལ་མིན་ཅིན་ཅིན་རྒྱུད་ལུང་ལོན་ཞེ་པ་རིག་ཅུལ་ལུགས་ལུ་ཡོན་ཀྱང་ནས་གསུང་བྱོས་གསལ་འཕུལ་ལུ་ཡོན་ཀྱི་མཛད་སྐོར་གྱི་སྐོར། ཅང་ཨོ་ཡོན་ཀྱང་མཚོག་ནས་ཀོང་སྤོལ་ཞེས་པ་བཅད་རྒྱུ་ལུ་ཡོན་ཀྱང་ལུ་ཡོན་ཀྱང་མཚོག་ནས་བཀའ་བཀའ་གནད་གསལ། (蒋委员长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二周年的纪念广播讲词), 《蒙藏月报》第13卷第4期。
- [67] 佚名. 1943. དགའ་འགོག་སྤྲོད་འཕུལ་གྱི་སྐོར། (抗建志要), 《蒙藏月报》第15卷第2期。

- [68] 佚名. 1943. འཚོགས་གསར་པ་ལེགས་ཡམས་ལོང་དགུ་སོང་བའི་དགའ་སྟོན་ཉིན་མའི་སྐབས་ཅང་ཡུ་ཡོན་ཀྱང་མཚོགས་སྐྱེས་ལུ་ལབ་ཡོངས་ཀྱི་མཉམ་སྐྱེས་མཐུན་པའི་ལོག་བཏང་བའི་གནད་དོན་གསལ་གསལ། (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 《蒙藏月报》第15卷第2期.
- [69] 佚名. 1946. ས་མཐའི་སྐད་ཡིག་མཁོ་སྤྱོད་སྟོན། (边疆语文应用问题), 《中央边报(汉—藏文)》第5期.
- [70] 佚名. 1947. རྒྱལ་ཁབ་ཚུན་གྱི་མི་གང་ས་ལས་ཤོད་སྟོན་ཆེ་རིགས་རྒྱུད་གསུམ་གྱི་མི་གང་ས་ལྟ་བུ་བའི་སྟོན། (由全国人口看蒙藏回三族人口), 《中央边报(汉—藏文)》第9期.
- [71] 佚名. 1947. མཐུན་པོ་མཐུན་པོ་བསྐྱེས། (边事合集), 《中央边报(汉—藏文)》第7-8合期.
- [72] 佚名. 1947. དབལ་དབྱིད་མི་སེར་རྒྱལ་ཁབ་ཆེན་པོའི་ཁྲིམས་ཅུ་མི་འགྲུར་གསར་གྱི་ཐིག་ཀི། (中华民国宪法), 《中央边报(汉—藏文)》第7-8合期.
- [73]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1834. *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Issues with 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as Seen i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I Xuan and Yexi Kanzhuo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1912–1949),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published a variety of bilingual (Chinese and Tibetan) and multilingual publications,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to convey political orders and news to Tibetans and people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se publications typically included highly political propaganda content,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or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and often involved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These Tibetan translations can be viewed as a vital step in the shaping of Tibetans’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By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se public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had evolved from non-existent to existent and from insignificant to considerable.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such concepts had critical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not only helping Tibetan intellectual elite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se concept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but also laying a key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andardizing these translations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Howev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uch Tibetan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was inadequate, leading to mixed and varied renditions. This, coupled with the limited audience for these publications, hinder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ncepts among Tibetan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among Tibetans at that time.

[Keywords] written Tibetan publications translation *Minzu* the Chinese Nation

(通信地址: 励 轩 610065 成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叶西勘卓 610065 成都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